

airiti

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 之政策工具研析暨其省思

徐胤承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摘要

在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CPUCH）之架構下，所謂「保護」，意指現地保存（in situ），以及無法現地保存時之陸上保存。通說認為，現地保存意味著將水下文化遺產留置在海底，避免商業開發或其他非必要之干擾；此即以保護為旨趣之首要考量，僅於遭遇萬不得已之情況下，且經正當程序，認定確有打撈水下文化遺產之必要，方得捨棄現地保存選項，退而尋求其他妥適保存方法。揆諸CPUCH內容，其為達成現地保存之公共政策目標，隱含了政策工具中常見之資訊工具及規則工具，然卻未見經濟工具，誠為一憾。本文試從釋明現地保存乃執行水下文化遺產保護最適方案之緣由為開章，再評述CPUCH暨其關係條約內蘊之政策工具優缺點，最後提出關涉系爭議題，且國際上曾用於水下文化遺產返還之特殊案例為佐證，即一種附帶經濟工具效果之政府沉船豁免承認，釋其效果可謂立竿見影，不惟大幅降低尋寶者不法獲利，亦可能適用於未來絕大多數已知或未知之水下文物所有權爭執事件，職是應堪認係突破既往窠臼之創新思維與方向；爰秉獻曝之忱，謹供識者

參酌。

關鍵詞：水下文化遺產、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現地保存、政策工具、文物返還

* * *

壹、前言

在《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以下簡稱：CPUCH）之架構下，所謂水下文化遺產，¹係指除電纜與目前正在使用之海洋建築物以外，其他全部或一部，週期性或連續性位於水下，且超過100年以上，具有文化、歷史或考古性質之「場址」（CPUCH第1條）。此外，CPUCH對前揭水下文化遺產之保護規範，係以現地保存（in situ）為先（CPUCH第2條第5項及附件規則1），抑或無法現地保存時，改以陸地上之保存或其他因應措施，為其主要考量順序。

所謂「現地保存」，乃將水下文化遺產留置在海底，避免商業開發或其他非必要干擾，僅在遭遇萬不得已情事下，且經正當程序——例如通過同儕審查（peer review）（Maarleveld et al. 2013, 62），認有必要打撈水下文化遺產時，方得捨棄現地保存選項，退而尋求其他妥善保存之法（CPUCH前言、第2條第5項及第2條第6項）。

現地保存作為CPUCH之優先選擇，乃基於以下數點原因：第一，現代考古學通說不侷限於打撈出水文物自身之照護，反更為看重文物與周圍環境所呈現之共通脈絡，探究者亦是場址周遭所關聯之連結情狀（徐胤承 2019b, 96）；故而「保護」一詞，實質上意味著保護整個場址之完整性，絕非單指保護場址內之離散物件而已。易言之，設若考古場址內含器物遭人取走，卻因缺

¹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國內法採「水下文化資產」之名詞，惟若就公約原文用語而言，「heritage」自應翻譯為遺產（胡念祖 2008, 8；陳貞如 2016, 104）。本文主要從國際法觀點出發，故而僅以水下文化遺產稱之，不就語義之法律歧異，另做進一步詮釋。

乏詳細紀錄查考緣由或過程，則該失所依附之器物，勢將與周圍環境產生位移性之斷層現象，此即所謂「去脈絡化」(de-context)。再者，水下考古本非陸地考古之例外，不論是沉船抑或是沉沒都市，都應和周遭環境融合，並將融合後之情狀視為一個整體，進而維持其完整性(intact)，亦屬至關重要之事(Judge 2008, 195)。

第二，不同時代對於考古之理解與領悟，恐亦不盡相同，但一般而言，隨著科技日新月異，考古技術也隨之進步。例如，19世紀德國考古先驅海因里希·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其在挖掘邁錫尼以及特洛伊古城時，便犯下一些如今看來相當明顯之失誤：諸如不正確地記錄考古場址地層及文物相對擺放位置(Easton 1998, 335-343)，而此等草率進行之考古方法，果然在多年後招致不少負面批評(Trails 1986, 91-98)。不僅於此，類似爭議尚發生在其他早期考古學家身上：例如，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爵士挖掘希臘克里特島上克諾索斯(Knossos)，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爵士挖掘埃及南巴勒斯坦遺址，以及凱莎琳·肯楊(Kathleen Kenyon)女士挖掘耶路薩冷內耶利哥城(Jericho)等等，不一而足(Gerstenblith 2000, 199)。以上例舉，絕非忽視或詬難考古先驅們過往對於發掘歷史遺跡文物所付出之偉大貢獻，但前揭不爭之實，的確也反映出過去之考古方法，並非總能禁得起現今嚴酷標準之檢視與考驗；而隨著時代遞嬗，學界對於考古之知與行，勢將迎向漸進之變革歷程，此乃學術發展之必然進程模式。是以吾人當應目光前瞻地競業以對，並聚焦於如何充分保全水下和海底文物，以待未來世代持用更加完善之技術，精準投入參研，以期有成；而非目光短視之急功近利，否則糾結於目前並非妥適之時間點，即圖戮力開發甚或抱持畢其功於一役之心態，則其後果堪虞(Manders 2008, 33)。

第三，除了以上有關考古脈絡之保護考量外，相較於異地置放出水海底文物，現地保存另有政策上堪可一提之其他優點：首先，鑑於海底光線比陸上昏暗，且氧氣濃度及溫度亦較陸上為低，因此海底文物不易因氧化作用而遭毀損。如同學者Couper所言，海底文物就像是時光膠囊(time capsule)，儲存了沉沒入水當時之資訊；苟將其貿然打撈出水，勢必面臨保存上之難題(Couper 1996, 283)。其次，如何保護水下文化遺產，目前尚屬於公共政策上較為邊

緣之議題，此乃現實客觀條件使然，以致研究單位所能獲得或支配之資金挹注及人力資源，一般難謂充裕，故而一旦出現大量海底文物出水之情況，恐難於短期內完善相關考古紀錄（Manders 2008, 33）。

綜上原因，現地保存乃保護水下文化遺產之首選途徑，殆無疑義。然而此一議題，在20世紀以前並未受到應有重視，此因彼時人們尚不具備大量打撈水下文化遺產之能力，以致一些值得探究之關注點，皆未浮出檯面。直到20世紀中葉以降，緣大量海底探測工具之發明暨普及化，借助新興海洋科技力量，寶藏獵人（treasure hunter）有計畫地尋找並打撈黃金、白銀、瓷器或其他高經濟價值之寶物，嗣再透過特定管道，攜至國際拍賣市場銷售，藉以獲得龐大利益（Zamora 2008, 19），至於某些低經濟價值之水下器物（例如殘缺之陶器），彼等則多認為無利可圖，故而幾無保存念頭；即以寶藏獵人打撈「南京貨物」（Nanking Cargo）為例，期間曾將破損而難以拍賣出高價之文物，隨意拋擲入海，惡行劣狀令人痛惜（Hutchinson 1996, 288）。²

蓋寶藏獵人之打撈行徑，與水下文化遺產之現地保存作為，兩者之間實難相容。緣此，在UNESCO官方報告中，寶藏獵人一直被視為竊盜及劫掠者（looters and pillagers）（UNESCO 2017, 7）；目前業經UNESCO列出已遭劫掠之沉船，包括著名之井里汶沉船（Cirebon wreck，10世紀沉沒，搭載約250,000件陶製品）、萬歷號（Wanli wreck，17世紀沉沒，搭載約700,000件瓷器）（UNESCO 2017, 7）、阿托查號（Nuestra Señora de Atocha，17世紀沉沒，搭載901根銀條、161根金條及約255,000枚銀幣）（Shallcross and Giesecke 1983, 373; Sutherland 2003, 162-176）、南京貨船（Nanking Cargo，又稱「哥德馬爾森號商船Geldermalsen」，18世紀沉沒，搭載約170,000件中國瓷器）（Zhao 1992, 326）、梅賽德斯號（Nuestra Señora de las Mercedes，19世紀沉

² 若以器物之經濟價值與考古價值而言，通常二者之間並無正相關。例如，位於多明尼加海域之「菸斗沉船」（Pipe Wreck），其於出水後重大發現之一，即所搭載之黏土（clay）、菸草（tobacco）及煙管（smoking pipes）等大量低經濟價值器物，卻足以提供考古學家許多證據，用以重塑英屬北美十三州時期之生活形態，此堪佐認其於考古之重要性斐然（Davey 2003, 159-163; Hall 2006, 20-22）。

沒，搭載約17公噸銀幣）、³中美洲號（SS Central America，19世紀沉沒，搭載約14公噸黃金），⁴以及的星號（*Tek Sing*，19世紀沉沒，搭載約350,000件瓷器）（Tjoa-Bonatz 2016, 96-100）。⁵

本文分析重點，乃試以CPUCH所隱含之——用以現地保存水下文化遺產兼及打擊寶藏獵人之政策工具，評論選用其中堪用者，闡述各自可能存在之優缺點，並指出CPUCH如援引文物返還概念，應能有效降低水下寶藏獵人不法獲利，最後舉出美國法院著名判例，據以佐參全篇重點論述，並就其可行性暨其效用，進行評估與建議。爰此，本文循藉自遠而近、漸入主題及學用合一之演繹方式，以期讀者對此領域之思辨及踐行，有所裨益。

貳、達成現地保存之政策工具

如前所論，CPUCH主要政策目標之一，乃期使水下文化遺產得以現地保存；而爲了達成此目標，如何良善管理並影響該標的之受衆（打撈者）不作爲（不予打撈），實爲政策核心之務。然以何種政策工具爲導向，誠屬另一大哉問。

對於不同政策工具之分類，隨著觀察視角變動而異其旨趣。因本文係從政策工具影響受衆行爲之視角出發，故綜觀學者Schneider及Ingram對於政策工具分類之意旨，應較符合本文所指之水下文化遺產現地保存議題。總括而言，兩人咸認公共政策之宗旨，盡皆建立在使特定目標受衆作爲或不作爲之意圖上，而政策工具主要目的，則用於協助此種意圖成爲現實（Schneider and Ingram 1990, 510）。兩人主張如前揭受衆抗拒某一公共政策，則可能基於以下五種原因：第一，受衆不認爲該政策存在權威（或稱「當權者」，authority）支

³ *Odyssey Marine v. Unidentified Shipwrecked Vessel*, 657 F 3d (11th Cir 2011).

⁴ *Columbus-America Discovery Group v. Atlantic Mutual Insurance Co*, 974 F 2d 450, 1992 AMC 2705 (4th Cir 1992), cert. denied, 507 US 1000 (1993).

⁵ 惟值得一提者，乃其中某些案例——例如中美洲號沉船打撈事件，寶藏獵人在美國法院已經獲得勝訴，亦即按照美國國內法目前之規範，引發該事件之打撈活動並未違法。參見美國判例*Columbus-America Discovery Group v. Atlantic Mutual Insurance Co*, 203 F 3d 291, 297 (4th Cir 2000)。然而在UNESCO之文件中，仍視之爲非法行爲，故其打擊寶藏獵人之嚴厲立場，以及與美國國內法之迥異處，頗堪玩味。

撐；第二，受眾缺乏執行該政策之動機；第三，受眾不同意該政策展現本身內蘊或其背後隱含之價值觀；第四，該政策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第五，受眾不知如何執行該政策（Schneider and Ingram 1990, 514）。

職是，渠二人亦認為如以前揭抗拒公共政策之因果關係為視角出發，則政策工具可被概分為下列五大類：第一，權威（authority），即政府藉由強制力達成政策目標；第二，誘因（incentives），即政府藉由操控（增加或減少）誘因，改變目標受眾行為，以達成政策目標；第三，能力建立（capacity-building），即政府授予目標受眾，甚至對應目標受眾之政府官員相關能力，使兩者具備執行政策之能力；第四，象徵與勸勉（symbolic and hortatory），即政府說服目標受眾，使該政策符合彼等價值觀或信仰；第五，學習（learning），即領導目標受眾與政府部門互動，共同參與政策形成過程之相關活動（例如公聽會）。

本文參考前揭公共政策脈絡，不拘泥於既定形式，引用更為簡單而淺易之分類，即Bemelmans-Videc、Rist及Vedung在所撰之*Carrots, Sticks, and Sermons: Policy Instruments and Their Evaluation*一書中提到之三種工具——規則工具、經濟工具及資訊工具，又被暱稱為棒子（sticks）、胡蘿蔔（carrots）及傳教（sermons），俾與前揭政策工具，互收相輔為用之效。

總結來說，規則工具代表棒子，即以政府強制力，例如刑罰手段達成目標；經濟工具代表胡蘿蔔，採獎勵方式達成目標；資訊工具則代表傳教，即以提供抑或解釋資訊之方法，形塑或重塑達成政策之環境（Bemelmans Videc et al. 2010, 50-52）。其中規則工具及經濟工具部分，其實在Schneider及Ingram歸納之分類中本已存在，本文亦保留其見解；至於第三項資訊工具，實可概括Schneider及Ingram之能力建立、學習及象徵與勸勉；此因彼等之原理，皆是藉由提供資訊，進而促使改變受眾行為，理應視為資訊工具之變形體，因而籠統歸於此類，尚非無憑之舉。

此處需釋明者，乃一般而言，分類學係分門別類之系統演化科學，故本身有其侷限性，亦即任何試圖區分之結果，都可能面臨化約論（reductionism）之問題，繼而造成無法將所有已知資訊、情況進行總結或歸類之爭議；此外，對於某一政策，不同類型之政策工具實則經常混用。試以我國刑法從刑之沒收

及追徵等規定為例，因其同時具有威嚇暨降低受刑者經濟利益之效果，按此邏輯分類，則其既屬規則工具，亦屬經濟工具。

然而，面向政策工具進行抽絲剝繭之系統分類，雖可能有其掛漏之缺，但的確有助於政策制定者釐清思路，進而提出更加完善且具體可行之政策方案（Lowi 1972, 299）；職是之故，本文援此思辨邏輯，謹以前揭規則工具、經濟工具及資訊工具三種經典分類為主調，針對CPUCH所欲有效達成之現地保存目標，選用相關政策工具，並以國際法視角，就其中優劣良缺、利弊得失或所造成之影響，進行分析評論，庶起拋磚引玉之作用。

參、國際法觀點下之保護水下文化遺產資訊工具

就保護水下文化遺產而言，目前之資訊工具及其載體，業以正式及非正式之教育手段，快速改變人們之思考模式，當能相當程度地避免非專業尋寶人（例如業餘潛水者或漁夫等）在觀光或打撈作業過程中，無意之間對水下文化遺產造成破壞（Techera 2011, 333）。即以美國為例，佛羅里達州海岸不僅是熱門潛水景點，亦為大量歷史沉船葬身海底之所在，但除了少數特定區域以外，該州並未封閉當地海域。雖然佛羅里達州業已制定禁止破壞水下文物之歷史資源法（Florida Historical Resources Act），但基於為數眾多之觀光客不了解該部法律以及保護水下文物之重要性（Scott-Ireton 2003, 5），該州遂提供詳細之教育課程，期使業餘潛水人員了解水下文化遺產保存之必要性，以及如何避免因輕忽或疏失而破壞歷史文物資源，俾對當地海洋生態之保護，有所助益（Scott-Ireton 2008, 120）。

按CPUCH條文亦內含數類資訊工具，包括了第20條之提高公眾意識、第21條之水下考古培訓，以及第22條要求主管機構展開有關之研究和教育活動，以資規範。此外，公約附件規則第25、30、33、35及36條，皆有水下文化遺產研究必須存檔並公開之規定；⁶且同規則第7條亦指出，在干擾水下

⁶ CPUCH係由條約主文35條及附件規則36條所組成，且附件之重要性實不亞於主文：誠如公約主文第33條明定，附件應視為公約一部分，而非僅供參考之用，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文化遺產保護及管理之情況下，應促進大眾參訪現地保存之水下文化遺產。而就此規範內得以展現之務實應用之一，即所謂「虛擬博物館」；具體言之，乃提供遠端使用者有如身歷其境之體驗，例如海中博物館（Museums in the Sea）網站，便將佛羅里達州沿岸部分沉船之影像式虛擬實境，引入至應用層面（Museums in the Sea 2007）。更有甚者，於充分使用資訊與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之條件下，吾人如以前揭實境化之虛擬博物館為基礎，延伸而出連結功能強大之線上社群，最終勢將塑造得以達成政策目標之更優質環（Ott and Pozzi 2011）。

回首反思我國在資訊工具之過往運用上，顯然表現尚難謂妥適。首先，我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雖有計畫地列冊水下文化遺產，但公開網站內查無具體內容（<https://nuwchgis.boch.gov.tw/portal/home/index.html>），且許久未曾更新（按：本文初稿完成於2020年7月，網站最後修改日期為2020年1月），民眾不易取得詳實而正確之資料。再者，文化部雖已提出《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劃設及管理辦法》（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6），然截至本文成稿為止，尚未實際劃分任何保護區，遑論如同前揭佛羅里達州案例般，進一步連結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區至虛擬博物館或線上社群，以致民眾難以藉由參與類似主題之實體或網路知性之旅，繼而成爲真正受惠者。

本文以爲，除政府機關賡續強化文宣作爲外，我國或可參酌美國佛羅里達州之做法，以設立沉船保護區並結合教育之方式，讓國人充分了解，打撈出水並非處置水下文化遺產唯一選項。吾人試以務實視角觀察此類保護區之建構宗旨，若能完備規畫並貫徹相應作爲，不僅足以保護所指定之特定海洋區域，本身亦內具寓教於樂之正向功能暨示範作用，從而提醒遊客，務必善盡保存歷史文物之責任，冀以留待後人欣賞（Scott-Ireton 2003, 5）。⁷

然而，資訊工具對於不特定之人雖有其效果，但就專門劫掠財貨文物之水下寶藏獵人而言，則幾無約制力可言，主因僅僅仰賴道德勸說，恐難致使彼等

⁷ 此外，鑑於此節議題關涉國際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以及我國國家公園相關法令規範，所跨之領域暨概括之範疇可謂寬廣龐大，故而筆者擬於近期內另撰專文分析，以供進階參考，併附敘明。

幡然悔悟，進而打消不法念頭。有鑑於此，CPUCH爰於條約內文，不惜篇幅重點構架設計以下具有一定效果之規則工具，諒非無由。

肆、國際法觀點下之保護水下文化遺產規則工具

CPUCH絕大部分條文皆聚焦於強化規則工具，以達成現地保存目標；是以，CPUCH伊始即禁止水下文化遺產之商業利用（non-commercial exploitation）（CPUCH第2條第7項），即是規則工具強力介入之明證。易言之，除了基於保護公益之少數例外情形（CPUCH附件規則2），原則上不得商業利用水下文化遺產，例如從事購買、販賣或出租等經濟行為。按該條文除了力圖斷絕水下寶藏獵人尋寶圖謀以外，同樣希望漁民及業餘潛水者，亦因無法販售水下文化遺產牟利，而無意起心動念，甚而不敢輕舉妄為；即使已撈得者，也願意上繳有司妥為處置。接著，第14條規範意旨則為「締約國應採取措施，阻止非法出口或以違反公約方式打撈取得之水下文化遺產進入其領土，以及在其領土上買賣或擁有此類不具合法性之水下文化遺產」；至於進一步提示暨要求，另載明於第17條——締約國應制裁違反CPUCH之非法行為，並剝奪違反者從中獲取之利益，以及第18條——締約國應扣押違反CPUCH所打撈之水下文化遺產。因此，就以上條文而言，無論觀其規範內容，抑或回歸應用層面，事實上皆是規則工具發揮權能功用之具體展現。

一、規則工具應用因地而異

而CPUCH爲了擴大以上規則工具之適用範圍，除國際公認屬於國家主權領域之內水及領海外，試圖重設國家對不同海域水下文化遺產之管轄權，即《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以下簡稱：UNCLOS）在海洋空間上劃分之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大陸礁層、公海、區域（the Area）等界限，可見其鋪墊之所圖非小。

就鄰接區而言，相較於UNCLOS第33條規定，沿岸國在鄰接區內享有海關、財政、移民及衛生等四項事務管轄權，以及UNCLOS第303條所示，沿

岸國保護鄰接區內水下文物，⁸準用第33條規定——即沿岸國得以利用海關權，阻止鄰接區內水下文物遭人移出現地；而CPOCH第8條則明文承認沿岸國有權管轄鄰接區內水下文化遺產；但深究之，此新創之管轄權制度，似非UNCLOS原有者（徐胤承 2019a，99）。

在大陸礁層部分，UNCLOS僅賦予沿岸國在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上享有經濟性主權權利（sovereign rights），使沿岸國得以逕行開發並利用前揭海域內自然資源（Churchill and Lowe 1999, 141-180），但不包括水下文化遺產在內；然CPOCH爲了擴大規則工具適用範圍，故而承認沿岸國得以行使主權權利，管理大陸礁層之水下文化遺產（CPOCH第10條第2項），此乃二者迥異之處。

除此之外，值得吾人特別關注者，乃CPOCH爲了強化管轄權，另又創設「協調國」（Coordinating State）制度。而所謂協調國，乃從沿岸國以及對水下文化遺產具備「可證實之連結」（verifiable link）——特別是文化、歷史或考古連結之國家選出（CPOCH第9條第5項及第10條第3項）。按查，協調國主要擁有三項權利：其一，協調國可進行所有實際之措施（all practicable measures），用以排除對水下文化遺產之立即危險（CPOCH第10條第4項）；其二，協調國能先於其他國家研究水下文化遺產（CPOCH第10條第5項第c款）；其三，協調國有權批准任何針對水下文化遺產提出之相關申請活動（CPOCH第10條第5項第b款）。舉例來說，假使吾人於菲律賓大陸礁層上發現一艘西班牙沉船，但其承載之貨物屬於葡萄牙，則符合前揭規範之菲律賓、西班牙及葡萄牙，皆具備協調國候選者資格，殆屬無疑。

概括檢視協調國制度，乍看似乎公平地考量沿岸國以及所涉其他國家之利益，實則不然，因爲只有沿岸國方具優先成爲協調國之權利（CPOCH第9條第5項及第10條第3項）。故在CPOCH框架下，沿岸國不只享有主權權利，尙可無條件先手成爲協調國，因而出現不滿CPOCH偏袒沿岸國之雜音，亦屬意料

⁸ 筆者特別於本節使用「水下文物」這個名詞，乃因UNCLOS內用之名詞並非水下文化遺產，而係「考古及歷史物件」（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objects）；究論之，原文似較接近系爭文物之意涵。

之內。

至於「區域」(the Area)方面，⁹按UNCLOS第149條規範，「區域」內水下文物，應是爲了整個人類利益而被保護或處置(preserved or disposed of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 as a whole)。然該條文僅屬宣示性質，對於具體手段毫無著墨之處，因而試圖修正此節弱點之CPOCH，爰亦採用規範大陸礁層之協調國制度(CPOCH第12條)，以資因應「區域」情況；惟二者唯一不同之處，乃列名協調國候選者，就「區域」而言，則僅限於具有可證實連結之相關國，主因無他，緣以「區域」內並無沿岸國存在之故。

通過前揭針對UNCLOS及CPOCH之比較研析，吾人應能理解，後者以地理考量爲核心，費盡功夫、拐彎抹角地承認國家得以在領海以外之海域，管理水下文化遺產，其目的不外乎試圖擴大規則工具之影響層面暨其範圍；然事與願違，就目前實務所見，其外溢效益尙難彰顯。

二、規則工具執行力問題

茲就保護水下文化遺產而論，規則工具是否有效，除考量所在海域類別之異同、沿岸國行政效率之良窳等因素外，通常亦取決於以下兩種情況：其一、位置已知之水下文化遺產；其二、位置不明之水下文化遺產（包括尙未被發現之水下文化遺產）。

相對而言，位置已知之水下文化遺產，其規則工具之執行力較強。雖然水下文化遺產不同於陸上博物館，難以派遣守衛常駐，但於海底建造「牢籠」，確能有效地圈圍並保護水下文化遺產(Maarleveld et al. 2013, 21-22)。類此封閉之海底環境，一般不具專業設備之人或物，勢將難以闖入；即使面對心存覬覦且擁有專業設備之寶藏獵人，亦能大幅增加其支出成本及盜取難度。除非該水下文化遺產本身即爲貴金屬（例如金、銀材質之物或錢幣）或高價古物，否則在本益比考量下，應尙不足以刺激彼等進行水下盜寶犯罪活動。

⁹ 所謂「區域」，乃位於大陸礁層外，往離岸方向之海底床範圍。基於水下文化遺產位於海底，而非懸浮於公海，故本文省略公海部分，僅以前揭「區域」做爲探究之分界，併附敘明。

然而，如水下文化遺產坐落在大陸礁層或區域等國家屬地管轄權所不及處，則即使知其位置，單就執法而言，仍是窒礙難行。舉例來說，目前水下文化遺產之主要來源，大多屬於大航海時代之西班牙、葡萄牙、英國、荷蘭等傳統海權國以及兩次世界大戰之美國、日本、德國等主要參戰國之船舶或軍艦，惟實情卻是這些沉船之地理位置，往往距離本國非常遙遠。設若吾人在太平洋區域發現來源國為西班牙之沉船，依前揭條約規範，協調國即為西班牙，不過該國是否確有餘裕管理千里外之水下文化遺產，難免令人置疑。

此外，位置未知之水下文化遺產，可能緣於以下諸般情況，導致規則工具效能大打折扣。

首先，因為位置不明，所以無從給予水下文化遺產任何物理性保護；再者，對於偽裝成非尋寶目的，隨機出現在任何海域位置之寶藏獵人船舶，並無依法執行且又有效之臨檢或追蹤手段。最後，雖然CPUCH第17條第3項要求締約國相互合作，以資確保規則工具得以落實執行，然而該條文並無具體配套措施，且許多「重要」國家迄未加入CPUCH，水下寶藏獵人大可將打撈出水之文化遺產，另循管道私運至其他非締約國販售。即以美國為例，其國內註冊了為數眾多之沉船打撈公司，且技術、經驗俱優，因而泰半水下寶藏獵人來自美國，並不讓人意外，故彼等對水下文化遺產現地保存政策之成敗，洵有直接影響；但是美國不僅未加入CPUCH，復又表明不同意其中若干條款（Bederman 1999, 331-54）。再如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其大陸礁層上亦有大量沉船，不過彼等對於保護水下文化遺產之概念，竟仍停滯在打撈為主、現地保存為輔之思維模式（Tjoa-Bonatz 2016, 87）；至於實踐上，更是不時出現違反現地保存原則之行事作為。¹⁰

是以就本節而言，在目前欠缺強而有力之約制條件下，規則工具之相關規範既難見具體成效，則短期之內恐將形同具文。

本文以為，現地保存未知位置之水下文化遺產，其最大威脅來自於跨國文物走私，而規則工具並非憑以對抗之良好手段，此由陸上實務經驗亦堪佐

¹⁰ *Malaysian Historical Salvors, SDN, BHD v.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16 April 2009) ICSID Case No ARB/05/10 para 4.

證——即使國家於國土內具有完整管轄權，且多數國家亦制定處罰盜寶之法律規定，但仍難以阻斷悍然不顧而絡繹於途之跨國盜賣活動。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以下簡稱：FBI）於2011年之一份調查報告指出，每年約有高達60億元美金之文物涉及私運不法（FBI 2011）。職是之故，通常在文物非法交易之防堵政策上，吾人尚需搭配特別之經濟工具，以期克奏膚功。

伍、國際法觀點下之保護水下文化遺產經濟工具

一般認為，如欲達成一個總體政策目標，應以配套方案之概念，交替使用各種足以相輔相成之政策工具，多管齊下，寬嚴並濟，促使臻於良善。學者Bator曾經整理出三種政策工具，用以防止跨國走私：一、物理性保護場址（physical protection at the site of the property）；二、刑罰震懾竊賊（deterrence through fear of punishment）；三、消除竊賊經濟動機（elimination of economic incentives）（Bator 1982, 310）；易言之，即規則工具及經濟工具之整合作為（蓋物理性保護場址，旨在刑罰震懾之外，額外增加竊盜成本及難度，屬於經濟工具之一種應用態樣）。不過，CPOCH卻未將經濟工具納入其中，揆其原因之一，極有可能係為了避免違反「禁止商業利用」原則；因為如欲使用經濟工具，必先承認水下文化遺產之經濟價值，如此一來，似與公約本身邏輯及其宗旨不合。然而，前揭思維方向乍看似乎合理，但不可否認者，CPOCH並未完全排除環繞在水下文化遺產周邊之經濟行為（CPOCH附件規則2），且商業利用與經濟活動之間，又非性質相同之等義詞。因此吾人認為，所謂惟恐商業化之擔憂理由，實不足為憑。為資釐清爭點，本節主要闡述水下寶藏獵人之商業模式，繼而釋明如何具體使用經濟工具，用以約制靡然成風之盜寶惡行。

一、水下寶藏獵人之獲利模式與打撈法

陸上與水下尋寶有許多相異點，其中與本文主題相關聯者，乃尋寶過程中所需支付之成本問題。茲以水下尋寶而論，除了極近岸之淺水區外，其他水

域之花費，可能高昂至一般人難以想像之地步。¹¹就其過程而言，寶藏獵人需先承租至少一艘具備探測設備，且能在開放海洋（open sea）續航之船舶；接著，尚需籌措能使該船良好運作之充足資金，包括燃料、船員薪資、生活必需品等必備預算。曾有報告指出，僅打撈位置已知之特定沉船，即需支出至少500萬元美金（Yorkshire Post 2004）；至於寶藏位置不明者，另須先期額外備妥之搜尋費用，往往高於純粹進行打撈所需支付之開銷。亦有報告指出，航行於海上之尋寶船舶，一天便需支出3萬元美金作業費用（Bryant 2001, 111）。即以打撈「的星號」（Tek Sing）為例，全部搜索成本約為2,000萬元美金（Zamora 2008, 26），所費不貲可見一斑。

囿於必須面對之高成本，以致水下寶藏獵人極重視尋找投資合作之金主，且其吸金引資過程往往具備某些特定行為模式：首先爲了便於募資，水下寶藏獵人常以法人形式公開呈現；其次，彼等樂於在媒體面前亮相，並將自己置於鎂光燈下，以期藉由曝光行銷，得到更多投資機會，此與一般認知寶藏獵人注重隱蔽性之刻板印象，正好相反（Temiño 2017, 193）；最後，彼等尚需面對極爲在意投資報酬之金主，並擔負尋寶成敗或收益多寡之全部責任。即以「的星號」為例，因爲公開拍賣出水之財貨金額遠低於金主期望值，最終衍生投資人猛烈抨擊阿德萊德（Adelaide）沉船救援公司董事之新聞事件，堪爲佐證（Zamora 2008, 26）。事實上，爲了取得金主信任，水下寶藏獵人大多習慣性地誇誇而談其鉅額收益；但根據正式研究資料提供之資訊，彼等水下尋寶之結果，其實多是入不敷出（Paull 1994, 371; Throckmorton 1998, 75; Kleeberg 2007, 17）。

而爲使公開募資順利，水下寶藏獵人特別注重法律程序，喜好運用打撈法（the law of salvage）取得合法物權或酬勞，俾以滿足投資人對一般正當公司之期待，以利集資運用。

所謂「打撈法」，非指某一國之某一部法律，而係泛稱基於海事上公共

¹¹ 一般來說，近岸區就是淺水區，但也會有例外，例如Java Sea就是延展到離岸之淺水區。該區域亦曾面臨許多違法打撈事件，也因爲存在Java Sea如此迥異尋常之海域，益顯資訊工具之重要性。

政策，提供誘因予海洋使用者，鼓勵彼等以打撈方式拯救陷於危難他者之法規（Dromgoole 2013, 168）；故對於打撈活動之法律定義，按查各國於國內法中有不同規範，細節可謂瑣碎，但較普遍性之一般定義，參見《國際救助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 ICS）第1條第(a)項規範，意指「援救於可航行水域或其他任何水域中，處於危險之船舶或任何其他資產之行爲或活動」（any act or activity undertaken to assist a vessel or any other property in danger in navigable waters or in any other waters whatsoever）。而前揭所謂「資產」（property），包括任何人造物之殘骸或遺留物（O’Keefe and Nafziger 1994, 394）。易言之，水下文化遺產既是一種人造物，則堪以初步推定（prima facie），其應已符合該公約所揭示之打撈活動定義範圍。

打撈活動雖能基於特定契約而行之，但寶藏獵人通常利用打撈法之純粹打撈（pure salvage）行爲（Force 2013, 164-166）——即未經先與物主間之契約同意，便自願（voluntarily）打撈海中初步符合危難態樣之人造物全部或其部分，藉以獲得獎勵金（Forrest 2003, 327）。而此類獎勵金往往所獲不貲，在「美國哥倫布發現集團v大西洋共同保險公司」（*Columbus-America Discovery Group v. Atlantic Mutual Insurance*）案例中，打撈者最終獲得相當於90%之被打撈財物，而如此鉅額利得之誘使，不啻係對有意效尤者之變相鼓勵。

再者，如果所打撈物係無主物（*res nullius*）或無法覓得物主，另可適用發現法（the law of finds）之規範（Dromgoole 2013, 172）——即打撈者同時爲發現者，得以獲取所打撈物之完整所有權（Brice 1996, 341; Carducci 2002, 425）。易言之，打撈法適用於能尋得原物主之物，而發現法適用於無主物或無法尋得物主之物（Dromgoole 2013, 171-173; O’Keefe and Nafziger 1994, 395-396），各有其適用範疇。而寶藏獵人多半視情況不同，分別對有主物主張高額打撈酬勞，抑或對無主物主張所有權，憑以獲利（Curfman 2008, 188）。

CPUCH第4條雖明文排除打撈法適用於水下文化遺產，且許多國家亦作如是規定，¹²但因《國際救助公約》第30條規定，任何國家在簽字、批准、接

¹² 例如澳大利亞聯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南非共和國（Republic of South Africa）（Dromgoole 2013, 180）、加拿大（Canada）、塞普勒斯共和國（Republic

受、核准或加入時，可就位於海床上具有史前、考古或歷史價值之文物提出保留（ICS, article 30(1)(d)），徒增寶藏獵人得以主張對己有利之法源依據。易言之，《國際救助公約》之締約國如果未對第30條提出保留，又非CPUCH之締約國，則寶藏獵人或可主張——該國在主觀上具有承認打撈法適用於水下文化遺產之確信（Dromgoole 2013, 206）。¹³

此外，部分非CPUCH締約國，例如美國及英國，即因承認打撈法與發現法適用於水下文化遺產（Garabello 2003, 123），從而可能衍生嚴重破壞現地保存規約之後遺，此乃英美法系所謂對物管轄（jurisdiction in rem）引申而來之法律效力。茲以美國為例，寶藏獵人只要能自美國領海以外之海床，先行打撈部分水下文化遺產送至美國本土，則美國法院即可因此而取得管轄權。¹⁴ 儘管美國法院多要求打撈者在進行過程中，應善盡保護水下文化遺產義務，否則無法主張報酬，¹⁵但並未從根本上阻止這種足以破壞現地保存情況之打撈行

of Cyprus）、丹麥王國（Kingdom of Denmark）、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 of Iran）、墨西哥合眾國（United Mexican States）、摩洛哥王國（Kingdom of Morocco）、挪威王國（Kingdom of Norway）、葡萄牙共和國（Portuguese Republic）、沙烏地阿拉伯王國（Kingdom of Saudi Arabia）、賽席爾共和國（Republic of Seychelles）及突尼西亞共和國（Republic of Tunisia）等（Nafziger 2000, 91; Forrester 2003, 334; Dromgoole 2005, 21）。

¹³ 然而於草擬CPUCH之專家會議時，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代表Augustin Blanco-Bazn認為ICS具私法性質，即使ICS某締約國不對ICS第30條提出保留，亦與CPUCH排除打撈法適用水下文化遺產之規範無關，另見UNESCO. 1996. “Report of the Meeting of Exper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UNESCO Doc. CLT-96/CONF.605/6 12 para. 48。

¹⁴ 參見美國判例：*Treasure Salver, Inc v. Unidentified, Wrecked and Abandoned Sailing Vessel*, 408 F Supp. 907 (D Fla 1976), aff’d, 569 F 2d 330 (5th Cir 1978); *Cobb Coin Co v. Unidentified, Wrecked and Abandoned Sailing Vessel*, 549 F Supp 540, 561 (SD Fla 1982); *Klein v. Unidentified, Wrecked and Abandoned Sailing Vessel*, 758 F 2d 1511 (11th Cir 1985); *Chance v. Certain Artefacts Found and Salvaged from the Nashville*, 606 F Supp 801 (D Geo 1985); *RMS Titanic, Inc v. Wrecked and Abandoned Vessel*, 286 F 3d 194, 197-98, 2002 AMC 1136, 1138-39 (4th Cir 2002)。

¹⁵ 有鑑於寶藏獵人之劣跡，美國打撈法即規範打撈者必須遵守考古相關守則，小心對待所有打撈出水之文物。例如，美國法院傳統上考慮六項因子，據以決定打撈者能否獲得一定額度之獎勵，而此考量，則被稱為「黑牆因子」（Blackwall factors），內容包括：(1)救助者所花費之勞力；(2)救助者展現出之果斷、技巧和精力；(3)救助者所使用之財產價值及其所面臨之危險；(4)救助者承擔之風險；(5)救得財產之價值；(6)拯救財產所承受之危險程度。而在「哥倫布—美國探索集團」（*Columbus-America Discovery*

爲。

如僅以法學理論角度觀之，英美等未加入CPOCH之國家，自有其立法主權，若無法證明現地保存爲強行法或習慣法，則無絕對是非可言（陳榮傳 2002，4）。然以運用國際條約做爲政策工具角度觀之，爲阻斷長久以來猖獗難禁之違法打撈或盜賣行徑，除前揭所述之資訊及規則工具外，如何透過各種文物返還機制或規範——諸如條約、判例或實踐，充作CPOCH戮力於保護水下文化遺產之制度補強，並在部分國家准允寶藏獵人藉由打撈法或發現法，憑以從中獲益，以致不利水下文物保護之前提下，大幅增添彼等合法取得系爭所有權之難度，不僅在政策工具上具有抑制非法打撈活動之功用，且於認事用法層面，亦能不失穩切合度，以期立竿而見影。

綜上，如何斷斷寶藏獵人之獲利模式，俾以事半功倍地達成懲前毖後之目標，反是吾人應予探究並正視之關鍵課題；故而下文略陳芻蕘之見，冀收拋磚引玉之效。

二、經濟工具之使用：文物返還

水下與陸上寶藏獵人盜寶動機類似，都是基於利益使然（Borodkin 1995, 406; Villanweva 1995, 575; Chang 2006, 866）。然而相較於後者，水下寶藏獵人之「營運」目的與投資金主之間更是息息相關；因此，若能參採可行之經濟工具，用以降低水下寶藏獵人暨募後金主之經濟動機，則其實用性及所能臻至之成就，應遠大於刑罰震懾之效果。

就國際法角度而言，使用經濟工具促成保護文物之政策目標，並非罕見新鮮；具體言之，所謂「文物返還」（*restitution*）概念及其相應作爲，即是其一。如同UNESCO所言，文物返還之主要宗旨，便是降低非法販運之盈利所

Group) 案例中，美國法院更周延地新增了第7項考量因子——即救助者爲保護系爭打撈物體之考古價值，所花費之精力，可見一斑，參見 *Columbus-America Discovery Group v. Atlantic Mutual Insurance Co*, 974 F 2d 450, 1992 AMC 2705 (4th Cir 1992), cert. denied, 507 US 1000(1993)。此外，英國也有類似規定，Article 13.3 of the Merchant Shipping Act 1995, for example, provides that '(c)the measure of success obtained by the salvor; (d)the skill and efforts of the salvor in salvaging the vessel, other property...' See *RMS Titanic, Inc v. Wrecked and Abandoned Vessel*, 742 F Supp 2d 784, 792 (ED Va 2010)。

得 (Lehman 1997, 543-544)。

國際上文物返還案例之所以發生，乃因法律主體所擁有或管轄之文物，已遭不法分子私運至他國，繼而由原管有者進行法律追討行動；不過最終訴訟結果，成功取回者固然不少，惟亦見敗訴致無功而返者，不一而足，緣由詳如後述及實例。

通說認為，文物返還因其主張之法律原因不同，概可分為以下兩類：

第一類為走私文物之原所有者，基於所有權之返還請求；而在國際私法上，物權請求權適用於物之所在地國法。不過仍須注意者，乃物權法雖普遍存在於各國，但其返還請求權，卻因不同國家之法律規範歧異而生變數 (Siehr 1997, 304)。舉例來說，由於大多數英美法系國家規定，竊賊無法取得有效所有權 (good title)，善意第三人亦不因其善意而取得失竊物之所有權，故在類似法律規範下，對於要求返還者而言，自然較為有利 (Kaye 1996, 25)。試以希臘東正教獨立教堂與戈德堡之爭訟案件 (*Autocephalous Greek-Orthodox Church v. Goldberg*) 為例：美國人戈德堡在瑞士購買了四塊西元六世紀時期在拜占庭製造之馬賽克玻璃 (以下簡稱：系爭玻璃)，按其來源原係1974年土耳其攻佔北塞浦路斯時，從當地教堂拆下之物，其後輾轉遭人外移到瑞士。基此事實，該教堂主張拆除伊始便是違法，所有權仍屬於教堂；但戈德堡辯稱購入當時對於系爭玻璃原始來源並不知情，應屬善意買家，依據購買地瑞士法規，自可取得所有權。然而，審判本案之美國印第安納州法院卻以物之所在地國法——即印地安納州法規為準據法，進行該案審理，而按照美國法律，善意第三人並不能取得贓物所有權，是以最終判決戈德堡必須返還系爭玻璃。¹⁶

其次，相對於前揭英美法系國家，某些國家——例如義大利和瑞士之善意第三人，則得以立即取得完整之失物所有權 (Pelt 1990, 461; Goldrich 1999, 141-142)。至於其他國家，其中不乏兼採而折衷者，例如我國即是——此觀我國民法 (物權篇) 第949條：「占有物如係盜贓或遺失物，其被害人或遺失人，自被盜或遺失之時起，二年以內，得向占有人請求回復其物」及同法第950條「盜贓或遺失物，如占有人由拍賣或公共市場，或由販賣與其物同種之

¹⁶ *Autocephalous Greek-Orthodox Church v. Goldberg*, 717 F. Supp. 1374 (S.D. Ind. 1989).

物之商人，以善意買得者，非償還其支出之價金，不得回復其物」之相關規定，自明其旨。因此單就我國而言，善意第三人於兩年內並不取得完整之失物所有權，如果該失物之物主願意償還善意第三人原支出之價金，據以取回物權，則後者恐需返還原物予前者。

第二類文物返還請求者必為國家，且該國家並非已被私運出境之文物所有者，其以系爭走私行為違反該國相關出口規範為由（例如禁止文物出口法），冀望物之所在地國執行文物來源國之出口法，並同意該國家提出之返還請求。然而，實務上類此請求權幾乎難逃失敗命運，主因國家之間並無互相執行對方出口法規之義務。例如英國經典案例——紐西蘭總檢察長控訴奧爾蒂斯（*Attorney General of New Zealand v. Ortiz*）案件，緣起居住瑞士之奧爾蒂斯，於1973年向某商人購入紐西蘭毛利族之文物，由於紐西蘭政府禁止毛利族文物出口，於是該文物遭人非法走私出口，嗣後輾轉交到奧爾蒂斯手上。原本紐西蘭政府毫無所悉，但因奧爾蒂斯之女兒遭歹徒綁架，伊為籌措贖金，遂於1978年透過蘇富比（Sotheby）倫敦拍賣會平台，試圖出售該文物。詎料旋被紐西蘭政府查知上情，並以該文物違反該國出口法令為由，要求英國扣押並返還文物；但英國法院審理後，認定該案不適用紐西蘭公法，最終判決紐西蘭政府敗訴。¹⁷ 而相似案例亦曾發生在義大利（Paterson and Siehr 1997, 147），依此而論，該類文物返還事件之國家請求者，如欲透過跨境訴訟方式取回失物，囿於目前法規適用暨執行面向所存在之不利因素，似乎難有勝算可言。

正因如此，許多原告國家只好轉向尋求非法律途徑——例如外交斡旋，以期取回已遭私運出境之文物（The Guardian 2017），然成功與否，端看外交實力或國力而定，此乃國際政治現實面之常態，若能善用己長，談笑折衝於千里之外，或有得以挽回劣勢之機會，故其重要性無庸贅述。

揆以UNESCO之思維方向，其實並不樂見此等不確定性極高之「外交返還」，反而試圖在國際法基礎上，建立一套完善之文物返還合作機制（Phelan 1998, 33），爰於1970年制定並推出備受各國矚目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防範

¹⁷ *Attorney General of New Zealand v. Ortiz*, [1982] 2 W.L.R. 10 (Q. B.), [1984] 1 A.C. 1 (C.A., H.L.).

文化資產非法進出口及轉移所有權公約》（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Preventing the Illicit Import, 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Property，以下簡稱：1970 UNESCO公約）（Prott 1983, 339），其最終目標，即爲了打擊文物走私及非法交易，並促使文物返還得以運作成功。其中法規部分，主要內容在於促請締約國得在符合1970 UNESCO公約架構下，提出一份國境內之文物清單，以供查考（第1條第(e)項及第(k)項）。如果該份清單開列之文物遭人偷盜，其他涉及案情之締約國，咸有義務幫助受害國執行扣押並返還該文物。此外，1970 UNESCO公約另提供一筆基金，資以協助締約國請求文物返還案件之順遂執行（General Conference of UNESCO 1999, 14）。申言之，設若吾人替換角度思考，則前揭文物列冊制度之創設，實乃彰顯1970 UNESCO公約之內在本質——即嘗試讓締約國之間，得以照章行事，互相執行對方國之出口法規（Siehr 2005, 1077）。

然而，縱有已存在之補強性規範佐助支撐，但是1970 UNESCO公約仍有其運用上之侷限性。例如，國家僅得在前揭清單上列出目前已知者，自不可能將未知部分一併造冊，因此保護範圍當然不及於埋藏地下、沉沒水下或是其他場址不明之文物。此外，1970 UNESCO公約對於如何妥處贓物轉手以後之善意第三人（*bona fide purchaser*），亦無明文規定，致使文物返還之成功率，遭受大幅壓縮。緣此，UNESCO遂於1970 UNESCO公約生效之數十年後，委託國際統一私法協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Unification of Private Law，以下簡稱UNIDROIT）另行起草一部新條約：1995年UNIDROIT針對偷竊及非法出口文物公約（UNIDROIT Convention on Stolen or Illegally Exported Cultural Objects，以下簡稱：1995 UNIDROIT公約）（Siehr 2005, 1077-1078），冀期於法規面，達到二者調和脈絡、交互作用之正向效果。

1995 UNIDROIT公約——做爲1970 UNESCO公約之補充性質條約（Vrdoljak 2006, 273），則改以所有權做爲文物返還之主要依據，並針對系爭所有權事宜，加以共同規範，繼而在不同國家間進行協調，俾利認事用法（Lehman 1997, 545）。首先，1995 UNIDROIT公約第3條承認國家擁有領土內所有未被挖掘或發現之文物，讓盜寶者即使到手或許被一般人視爲無主之文物，亦可構成偷竊行爲。除此之外，在1995 UNIDROIT公約框架下，原則

上文物返還問題採行「絕對返還」之規範模式；意指購買失竊文物者，縱然是善意第三人，在獲得合理補償金之情況下，即有義務返還該文物（第4條）（Veres 2013, 101-102）。另補充說明者，乃鑑於文物返還之主要依據在乎所有權，是以無論自然人或法人，皆得引用1995 UNIDROIT公約而獲得物之所在國協助（Cutting 2009, 949），故可認定，類此政策調節作為，毋寧亦可視之為司法框架下之國際合作模式。

不過1995 UNIDROIT公約在第5條第1項另有規定，即締約國之間應該相互支持，以來源國出口法規為文物返還依據。然細繹該規定內容，便非前揭絕對返還模式，概因來源國必須證明系爭走私物件有其重要意義，始得適用（Siehr 2013, 91）。以此觀之，1995 UNIDROIT公約所設計者，乃以第一類所有權之主張，為文物返還主要依據；至於第二類出口法規之主張，則僅係輔助依據。而類此以所有權為主幹之司法途徑，本身有其難以被取代之優勢，自非其他效果不彰或無的放矢之方式堪能比擬者；例如學者Pelt即認為，如考量返還成功率，主張民事索賠者在以下數方面，顯然優大於劣：一、民事之訴中，鼓勵原物主控告文物之經手者，如此應有更大機會發現所有涉案之人；二、民事訴訟得以不受限地更廣泛應用（主因無論自然人或法人，凡具備當事人能力者，皆能成為原告或被告，而不限於政府）；三、被告難以援引憲法層級之人權保護（例如財產權）條款，據以對抗國家徵收（Pelt 1990, 452-453）。

無論如何，1970 UNESCO公約及1995 UNIDROIT公約皆希望透過前揭規範之法規和機制，讓有心盜寶者畏罪而退，即使僥倖得手抑或事後想方設法轉移贓物，仍可能面臨原告之民、刑事追訴，藉以迫使彼等難以藉由公開拍賣牟取暴利，甚或高調尋求合作金主，如此一來，盜寶集團勢將面臨所得驟降暨成本大增之高度風險，進而有效地削弱走私文物之不法動機（Fox 1993, 252）。如同學者Levine所言，國際間如果合作採行1995 UNIDROIT公約，將能達成保護文化遺產之宏大目標（Levine 2011, 753）。

然而值得關注者，乃前揭文物返還兩公約規範之畛域，僅限國家領土，並不適用於非領土地區。由於鄰接區以外海底，並非任何國家領土，故而CPOCH難以如同1995 UNIDROIT一般，明文承認沿岸國擁有該海域之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至於文物返還議題上，設若離開了所有權之依傍，則CPOCH

僅得使用第二類主張——即以進出口法規為根據，援引CPOCH第18條規定，要求締約國扣押在來源國領土內打撈出水之水下文化遺產。然而，鑑於目前CPOCH締約國僅60國，且大多並非富有國家（意指潛在買家不多），水下寶藏獵人沒有理由、亦無必要甘冒偌大風險，率將打撈物私運移至締約國銷贖，彼等大可於非締約國穩妥地出售。此外，由於CPOCH和1970 UNESCO公約於某些規範上並未合意連結，因此，如果物之所在地國尚非CPOCH之締約國，則來源國亦無法逕以1970 UNESCO公約為根據，要求物之所在地國協助執行扣押作為。基於上述理由，吾人似可認知，CPOCH第18條之規範不過徒具虛文，恐難於現況下做到放諸四海而皆準之地步。

是以吾人當能預見，如果水下寶藏獵人取走鄰接區、大陸礁層或區域內之水下文化遺產，囿於條約內容並未明文規範，恐無任何國家得以提出文物返還主張。換句話說，針對破壞前揭海域現地保存水下文物規範之寶藏獵人，目前尚缺乏其他有效法制手段，強令彼等吐出業遭吞沒之贓物；長久以還，恐將造成任憑予取予奪且又無法可管之極大漏洞。總而言之，缺乏此類經濟工具之約制應用，觀諸CPOCH之執行成績單，或將呈現威信漸失之紅字，甚至可能面臨成效大打折扣之窘境。

溯源而論，其實任何船舶在沉沒之前都有其所有權人，而物權是否即因船舶沉沒海底數十年或數百年之久，而自動歸於消滅，則不無可議之處；倘以對此持否定說之美國經典判例「*Columbus-America Discovery Group v. Atlantic Mutual Insurance Co*」所闡述之實務見解而言，其中頗多值得吾人參採之處。因此，既然所有權不因締約國數量多寡而易其體用，則CPOCH應否嘗試適時變革修正，以資因勢利導，實有深入討論空間。

陸、「附帶經濟工具效果之政府沉船豁免承認」

雖然陸地文物返還之請求依據，對於國家主權範圍以外海域之應用，仍有窒礙難行之處，但由於海洋法專條承認各類型政府船舶豁免，且未規定船舶沉沒後豁免即隨之消滅，故而相較於陸地文物，沉船承載之水下文物，反倒享有一種能被來源國主張返還之特殊請求依據；而這種依據如運用得當，自得成爲

一種經濟型之政策工具，是以本文將此依據稱之為「附帶經濟工具效果之政府沉船豁免承認」。

所謂主權豁免（Sovereign immunity），乃因各國之間在法律地位上之平等，故一國應免遭受他國法院管轄（O’Keefe and Tams 2013, xxxvii），即「*par in parem non habet imperium*」（Orakhelashvili 2019, 231）。主權豁免之具體實踐，一般常見於外交人員；然除此之外，另在國際海洋法領域內，凡涉及主權豁免，一般多指一國管轄權所不及之他國船舶，故其扮演者，亦是舉足輕重之角色。

經研，UNCLOS專條承認之主權豁免類型有三：第一種為軍艦（第29條），而且幾乎是絕對豁免（第95條），況乃多有案例可稽。¹⁸第二種為政府非商業性服務之船舶（ship operated by government，第96條），屬於功能導向（function-oriented），不取決於船主是否為政府；意指即使政府不擁有該船，只要做為政府公務之用，則仍享有豁免。第三種為政府所有船舶（第96條），此類豁免，概由一般國有財產延伸而來。

一則在美國爭訴多年之案例——*Odyssey Marine Exploration, Inc v. Unidentified Shipwrecked Vessel (the case of Mercedes)*，足以釋明在理想情況下，國家對沉船主張主權豁免，確能有效打擊寶藏獵人。同理可推，沉船如享有主權豁免，勢將有效降低彼等藉由打撈水下文物所取得之經濟利益。

回溯2007年3月，一間專業海底尋寶公司——Odyssey Marine Exploration（Odyssey），在直布羅陀西方100海里處發現一艘沉船。¹⁹雖然該沉船殘骸四散海床，Odyssey最終仍然撈得約594,000枚銀幣，並於次月將一部分打撈物攜至佛羅里達州中區聯邦地方法院（Middle District of Florida），做為物權訴訟（*action in rem*，即英美法中由權利人為「原告」，以「物」為「被告」，從而確定權利人與該物之關係）之證據，主張基於發現法及打撈法相關規定，伊應取得沉船所有權及打撈獎勵。

¹⁸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ITLOS Case No. 26; *The ‘ARA Libertad’ Case (Argentina v Ghana)* ITLOS Case No. 26.

¹⁹ *Odyssey Marine v. Unidentified Shipwrecked Vessel*, 657 F 3d (11th Cir 2011) para 1166.

西班牙政府得知上情後，指認該艘沉船原為歷史上失蹤之西班牙海軍軍艦——即*Nuestra Senora de las Mercedes y las Animas*（以下簡稱：*Mercedes*），並聲明其主權涵蓋沉船本體及其所載貨物；繼而主張，基於主權豁免，美國法院應無管轄權。此外，秘魯亦出面澄清該艘沉船所運送之貨物多來自當地，而非西班牙，因此認定該國擁有貨物所有權；其間甚而出現25名拉丁美洲人士，表示彼等為貨物物主之法定繼承人，主張擁有繼承權。一時之間法庭風起雲湧，各方角力於焉開展。

被告方Odyssey答辯略以，*Mercedes*雖然名義上是軍艦，但積極從事私經濟行為，因此不應享有豁免，即所謂「限制豁免」（restrictive immunity）。Odyssey同時提出幾項事證，例如：*Mercedes*當時運載貨物中有75%為私人所有，並且也向私人收取1%運費；此外，Odyssey另又發現*Mercedes*事實上服務於西班牙海事郵局（*Spanish Correos Maritimos*），而非國防部，因此質疑其軍艦身分不符實情，是以主張不應享有主權豁免。

美國法院審理後認為，雖然*Mercedes*的確有運輸私人貨物之事實，但西班牙海軍原本就有載運且護衛該國臣民財物之慣例，尤其是在準戰爭時期，因而此種運送模式不屬於私經濟行為。此外，*Mercedes*雖服務於西班牙海事郵局，但仍接受該國海軍命令，並非真正隸屬於前者，故難謂與軍事無直接關聯。

判決最後認定，*Mercedes*的確是西班牙軍艦，享有豁免；而不論貨物原所有權為何人擁有，都被此豁免效果「一籃子」地含括。因此，縱然貨物所有權可能被25名私人分配，秘魯政府亦可能具有私法上利益，但在軍艦主權豁免之前提下，西班牙方具此案管轄權，而非美國，最終法院命令Odyssey須將打撈自*Mercedes*之寶藏返還予西班牙。

此一經典案例，展示出主權豁免主張如何以反射效果降低寶藏獵人之經濟利益，其中值得欣慰者，乃在訴訟程序上，主權豁免主張伊始即能起到阻止寶藏獵人進入實體訴訟之作用，間接促使標的物（水下文化遺產）得以及早返還原物主國，並大幅增加寶藏獵人意圖興訟所需支應之預算成本。此外，誠如前文，寶藏獵人之收益一般來自於投資者以及買家（Kaye 1998, 93）；參據常人趨利避險之預期心理，彼等恐皆無意願購買或挹注資金於顯然被主權豁免效果涵蓋之文物，庶免無利可圖甚至可能血本無歸。而更為重要之內蘊意義，在於

針對沉船主權豁免之承認原本即來自UNCLOS，其締約國數量眾多，影響力復又深遠，應能有效填補居於相應地位之CPOCH——其缺漏或不足之處。

惟吾人仍應留意者，乃對於沉船主權豁免之主張，縱有前述之利多情形，然而做為政策工具使用，因應沉船用途不同，其能達成之效果也有所差異。效力最強者自非軍艦莫屬，此因軍艦有其特殊地位，難以被認定為從事與軍事無關之商業活動。例如在上開案例中，即使Odyssey舉證並主張Mercedes軍艦涉入商業行為，法院於衡酌後仍不採認。除判決理由外，吾人亦可由美國政府公布之「法院之友」（*amicus curiae*，即英美法中，訴訟當事人以外之第三方提供法院參考之書面意見）了解其他關鍵事由——「法院之友」提及，無論是1958年《公海公約》抑或UNCLOS，都明確區分軍艦和其他政府船舶相異之處：雖然特別限定軍艦以外政府船舶不得涉入私經濟行為，但反觀軍艦則無此類似規定（The United States 2010）。亦即在海洋法體系中，軍艦並不因其涉及商業行為而當然失去豁免。

至於主權豁免之於非軍艦政府船舶，揆以充當抑制寶藏獵人之政策工具而言，效力顯然較弱。而所謂政府船舶，概可歸為兩類：一是船舶並非政府所有，但由政府實際支配使用；二是船舶原本即屬政府管有。是以處理此兩類船舶之主權豁免問題，自應遵照一般國際法對於國家進行私經濟行為之限制豁免相關規範，依據事實認定主張既有權利，以資適法適用。惟若確認該兩類沉船在沉沒時從事私經濟行為，則或無法主張豁免（至於是否仍得主張該權利，仍需視個案而定），繼而回歸至一般情況之文物返還體制。

細究CPOCH內容，其對政府沉船部分提供了三種各異之制度，主要區別僅取決於沉船所在海域之不同，但對豁免主張反倒添加不少限制，且未提及文物返還議題，難謂無顧此失彼之憾。首先，當政府沉船在他國領海被發現時，依據CPOCH（下同）第7條第3項規定，沿岸國需（should，非強制義務shall）向船旗國以及其他具有真實連結之國家報告上情。再者，當政府沉船在他國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被發現時，第10條第7項規定主權豁免推定適用；然而，第10條第2項竟又規定沿岸國有權禁止（或授權）任何直接影響該政府沉船之活動，資以保護沿岸國主權權利；不惟如此，第10條第4項另規定協調國（Coordinating States）得在緊急情況下進行單邊措施（unilateral

measures)。最後，只有當政府沉船在「區域」(the Area)被發現時，方享有UNCLOS所規範之豁免權利。也就是說，CPUCH就主權豁免議題，並不同於其1994年及1998年所擬草案版本(後兩者完全未觸及該議題)，而是採取一種迂迴作法——一方面CPUCH於其條文摻和內含政府船舶及航空器(State vessels and aircraft)之規範內容(第1條第7項)，等同暗示其承認政府船舶之概念；但在另一方面，針對領海、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CPUCH又賦予沿岸國及協調國於某種程度內，得以主張對政府沉船管轄權(第7條第3項及第10條第7項)。以上表述不一情形，乍見或有霧裡看花之感，惟究竟何以致之(囿於主權豁免議題明文化之敏感性，故而暫且擱置；原即存有表裡相濟旨趣，以待未來修法時機；抑或另有其他緣由)，恐需另行深入探究之。

誠然，沒有任何一種政策工具能臻至完美無瑕之境界，故其應用上之侷限性，在所難免。即使是得以發揮打擊水下寶藏獵人作用之主權豁免政策工具，其對承載水下文物之私有沉船，顯然無能為力。但若綜觀目前業已出水或探知場址之水下文化遺產，船舶私有者並不多見(主因私人於古代難以建造遠洋船)，故而主權豁免主張，敢言效果立竿見影，不惟大幅降低尋寶者不法獲利，且適用於未來絕大多數已知或未知之水下文物所有權爭執事件，堪認為突破既往窠臼之創新論述。

柒、結論

迄今為止，CPUCH之締約國數量雖然不高，但其確已喚起國際上對於該議題之關注。職是之故，即使許多國家仍不願成為締約國，泰半亦能務實地了解現地保存之重要性，並配合國際趨勢制定相關國內法規，戮力朝向執行水下文化遺產之保護政策前進。然而遺憾者，乃UNESCO以及制定關係條約之締約國，情知各類政策工具並非互相排斥，其實亦可併行而不悖，且若使用得當，甚至可以發揮其顯在效能；卻未於CPUCH搭配並融入效果雖異但具互補作用之各類政策工具，致使CPUCH因過度仰賴規則工具之執行面向，率爾輕忽得以相輔而行之其他政策工具。例如對於現地保存之期望，悉予寄託於刑罰之思維邏輯，即是近乎於偏執之見。惟其能否確實達到懲前毖後之成效，難免

啓人疑竇。

另一方面，UNESCO雖在制定CPUCH之前，即以1970 UNESCO公約以及1995 UNIDROIT公約爲框架，結合不同政策工具，建制一套文物返還體系，嗣經關係法律規範及實踐經驗，不可否認者，乃該兩公約業已針對立法旨趣——即迫使寶藏獵人無利可圖進而降低犯罪動機，做出相當貢獻；惟截至目前爲止，備受各國重視之CPUCH，仍未與該文物返還體系連結，導致針對現地保存位置未知之水下文化遺產之前瞻性作爲，遭遇無法得以循法適用之困擾，難免令人嗟嘆。

綜上論結，礙於國際政治現實因素，我國在短期內恐難參與締結前揭條約，遑論倡言修正或補強相關規範條文，此乃現階段應予體認之事實，亦係未來亟待以實際行動突破之涉外瓶頸。惟吾人認爲，當前不利情勢縱然如斯，我國仍需針對CPUCH暨其關係條約內容，明察深究，並權衡其中良窳得失，借鏡觀形，俾以做爲未來規劃、修訂國家海洋暨文化政策之重要參考依據，是所至盼。

（收件：109年2月17日，接受：110年1月28日）

Policy Tools and the CPUCH: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Yin Cheng Hsu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Program in Ocean Policy,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UNESCO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CPUCH), the first op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UCH) is ‘in situ preservation,’ which means UCH ought to be left on the sea floor. Shipwreck recovery activities are necessary if and only i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require them to happen. While multiple policy instruments are used to achieve the in situ preservation, economic instruments are rarely applied.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 short paragraph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in situ preservation. Then, an analysis on the policy instruments behind the design of the CPUCH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is presented. Finally, the paper presents a legal case study that explores the restitution practice at sea. Through the above points, the writer hopes that this article would generate help and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policies and for law makers.

Keywords: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UNESCO, In Situ, Policy Tools, Restitution

參考文獻

- 陳榮傳，2002，〈由國際私法觀點論文化資產沉沒品之所有權及相關問題〉，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91-2414-H-031-005，臺北：行政院國科會。Chen, RongChua. 2002. “You guo ji si fa guan dian lun wen hua zi chan chen mei pin zhi suo you quan ji xiang guan wen ti” [The Ownership and Related Problems of the Sunken Cultural Properties: A Conflict-of-Laws Perspectiv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Project number: NSC91-2414-H-031-005.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胡念祖，2008，〈水下文化資產法令研擬計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委託研究報告，計畫編號：PG9611-0197，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Hu, Nian Zu. 2008. “Shui xia wen hua zi chan fa ling yan ni ji hua” [Drafting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Legislation].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Research Project. Project number: NSC91-2414-H-031-005. Taipei: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 陳貞如，2016，〈海洋臺灣—初探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月旦法學雜誌》，257：103-112。Chen, Zhen Ru. 2016. “Hai yang tai wan-chu tan shui xia wen hua zi chan bao cun fa” [A Visit to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The Taiwan Law Review*, 257: 103-112.
- 全國法規資料庫，2016，〈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劃設及管理辦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70116>，查閱時間：2020/12/08。Laws and Regulations Database. 2016. “shuixia wenhuazi chanbao hu quhuashejiguan liban fa”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Designation and Management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ccessed on December 08, 2020).
- 徐胤承，2019a，〈書評：水下文化遺產與國際法〉，《文化資產保存學刊》，48：95-102。Hsu, Yin Cheng. 2019. “shu ping shui xia wen hu ayi chan yu guo ji fa” [Book Review: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ternational

- Law].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48: 95-102.
- 徐胤承, 2019b, 〈書評：水下文化遺產活動手冊〉, 《臺灣人類學刊》, 17 (1): 94-98。
- Hsu, Yin Cheng. 2019. “shu ping shui xia wen hua yi chan huo dong shou ce” [Book Review: Manual for Activities Directed at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7 (1): 94-98.
- Bator, Paul. 1982. “An Essay 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Art.” *Stanford Law Review*, 34 (2): 275-384.
- Bederman, David. 1999. “The UNESCO Draft Convention on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A Critique and Counter-Proposal.”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30(2): 331-54.
- Bemelmans-Videc, Marie-Louise, Ray Rist and Evert Vedung. 2010. *Carrots, Sticks, and Sermons: Policy Instruments and Their Evaluation*. Piscataway,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Borodkin, Lisa. 1995. “The Economics of Antiquities Looting and a Proposed Legal Alternative.” *Columbia Law Review*, 95 (2): 377-417.
- Brice, Geoffrey. 1996. “Salvage and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Marine Policy*, 20 (4): 337-342.
- Bryant, Christopher. 2001. “The Archaeological Duty of Care: The Legal, Professional, and Cultural Struggle over Salvaging Historic Shipwrecks.” *Albany Law Review*, 65: 97-146.
- Carducci, Guido. 2002.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of the Sea: The UNESCO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6: 419-434.
- Chang, David. 2006. “Stealing Beauty: Stopping the Madness of Illicit Art Trafficking.” *Houst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8 (3): 829-869.
- Churchill, Robin, and Alan Lowe, 1999. *The Law of the Se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ouper, Alastair. 1996. “The Principal Issues in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Marine Policy*, 20 (4): 283-285.

- airiti
- Curfman, David. 2008. "Thar Be Treasure Here: Rights to Ancient Shipwrecks in International Waters-A New Policy Regim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86: 181-207.
- Cutting, Christopher. 2009. "Protecting Cultural Property Through Provenance." *Seattle University Law Review*, 32: 943-970.
- Davey, P. 2003. "A 17th-Century Clay Pipe from the Salcombe Wreck Site." *Post-Medieval Archaeology*, 37 (1): 159-163.
- Dromgoole, Sarah. 2005.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Lessons from the Titanic." *Amicus Curiae*, 61: 17-24.
- Dromgoole, Sarah. 2013.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aston, Donald. 1998. "Heinrich Schliemann: Hero or Fraud?" *The Classical World*, 91 (5): 335-343.
- FBI. 2011. "Art Theft." <http://www.fbi.gov/hq/cid/arttheft/arttheft.htm> (August 19, 2019).
- Force, Robert. 2013. *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 Washington, D.C.: Federal Judicial Center.
- Forrest, Craig. 2003. "Has the Application of Salvage Law to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Become a Thing of the Past."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34 (2): 309-349.
- Fox, Claudia. 1993. "The UNIDROIT Convention on Stolen or Illegally Exported Cultural Objects: An Answer to the World Problem of Illicit Trade in Cultural Property." *Americ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9 (1): 225-267.
- Garabello, Roberta. 2003. "The Negotiating History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In Roberta Garabello and Tullio Scovazzi, eds.,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pp. 89-192. Leiden,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 Gerstenblith, Patty. 2000.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Restitution of Cultural

- Objects.” *Connecti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6 (2): 197-246.
- Goldrich, Ian. 1999. “Balancing the Need for Repatriation of Illegally Removed Cultural Property with the Interests of bona fide Purchasers: Applying the UNIDROIT Convention to the Case of the Gold Phiale.”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3: 118-164.
- Hall, Jerome. 2006. “The Monte Cristi ‘Pipe Wreck.’” *Heritage at Risk*, 20-22.
- Hutchinson, Gillian. 1996. “Threats to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The Problems of Unprotected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 Sites, Wrecks and Objects Found at Sea.” *Marine Policy*, 20 (4): 287-290.
- Judge, Christopher. 2008. “The South Carolina Heritage Program: Fifteen Years of Archaeological Site Acquisition and Management.” In Francis McManamon, Andrew Stout and Jodi Barnes, eds., *Managing Archaeological Resources: Global Context, National Programs, Local Actions Trust*, pp. 195-204. New York, NY: Routledge.
- Kaye, Lawrence. 1996. “The Future of the Past: Recovering Cultural Property.” *Cardoz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4: 23-41.
- Kaye, Lawrence. 1998. “Art Wars: The Repatriation Battle.”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31: 79-94.
- Kleeberg, John. 2007. “The Law and Practice Regarding Coin Finds: United States Laws Concerning Historic Shipwrecks.” *Compte Rendu*, 54: 13-29.
- Lehman, Jennifer. 1997. “The Continued Struggle with Stolen Cultural Property: The Hague Convention, the UNESCO Convention, and the UNIDROIT Draft Convention.” *Arizo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14 (2): 527-549.
- Levine, Alexandra. 2011. “The Need for Uniform Legal Protection against Cultural Property Theft: A Final Cry for the 1995 UNIDROIT Convention.”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6 (2): 751-780.
- Lowi, Theodore. 1972. “Four Systems of Policy, Politics, and Choi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2: 298-310.

- Maarleveld, Thijs, Ulrike Guérin, and Barbara Egger. 2013. *Manual for Activities directed at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Guidelines to the Annex of the UNESCO 2001 Convention*. Paris, France: UNESCO.
- Manders, Martijn. 2008. "In Situ Preservation: 'the Preferred Option.'" *Museum International*, 60 (4): 31-41.
- Museums in the Sea. 2007. "Florida's 'Museums in the Sea.'" <http://www.museumsinthesea.com/index.htm> (December 08, 2020).
- Nafziger, James. 2000. "Historic Salvage Law Revisited."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34 (1): 81-96.
- O'Keefe, Patrick, and James Nafziger. 1994. "The Draft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25: 391-418.
- O'Keefe, Roger, and Christian Tams. 2013.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Roger O'Keefe, Christian Tams, and Antonios Tzanakopoulos, ed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A Commentary*, pp. 35-96.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rakhelashvili, Alexander. 2019. *Akehurst's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K: Routledge.
- Ott, Michela, and Francesca Pozzi. 2011. "Towards a New Era for Cultural Heritage Education: Discussing the Role of IC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7: 1365-1371.
- Paull, James. 1994. "Salvaging Sunken Shipwrecks: Whose Treasure Is It? A Look at the Competing Interests for Florida's Underwater Riches." *Journal of Land Use and Environmental Law*, 9(2): 347-373.
- Paterson, Robert, and Kurt Siehr. 1997.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egal Science 1996 Confere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Rabat, 11-12 September 199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6 (1): 144-150.
- Pelt, Meredith. 1990. "Autocephalous Greek Orthodox Church of Cyprus v. Goldberg and Feldman Fine Arts, Inc.: A Case for the Use of Civil Remedies in

Effecting the Return of Stolen Art.” *Dickins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 (3): 441-464.

Phelan, Marilyn. 1998. “The UNIDROIT Convention on Stolen or Illegally Exported Cultural Objects Confirms a Separate Property Status for Cultural Treasures.” *Villanov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5 (1): 31-58.

Prott, Lyndel. 1983.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Illicit Movement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The 1970 UNESCO Convention and Some Possible Alternatives.” *Syracu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merce*, 10: 333-351.

Schneider, Anne, and Helen Ingram. 1990. “Behavioral Assumptions of Policy Tool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2 (2): 510-529.

Scott-Ireton, Della. 2003. “Florida’s Underwater Archaeological Preserves.” In James Spirek and Della Scott-Ireton, eds., *Submerged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Preserving and Interpreting Our Maritime Heritage*, pp. 95-105. Berlin, Germany: 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Scott-Ireton, Della. 2008. “Teaching ‘Heritage Awareness’ Rather than ‘Skills’ to Sports Diving Community.” *Journal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3: 119-120

Shallcross, Douglas, and Anne Giesecke. 1983. “Recent Developments in Litigation Concerning the Recovery of Historic Shipwrecks.” *Syracu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merce*, 10: 371-404.

Siehr, Kurt. 1997.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6: 304-325.

Siehr, Kurt. 2005. “Siehr,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Culture: Recent Trends toward a Liberal Exchange of Cultural Objects.”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38 (4): 1067-1096.

Siehr, Kurt. 2013. “Unidroit Convention of 1995 and Unclaimed Cultural Property without Provenance.” *ELTE Law Journal*, 2013: 89-102.

Sutherland, Amanda. 2003. “Perceptions of Marine Artefact Conserv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Destruction and Theft.” In Neil Brodie and Kathryn Walker Tubb, eds., *Illicit Antiquities: The Theft of Culture and the Extinction of*

- Archaeology*, pp. 162-176. London, UK: Routledge.
- Techera, Erika. 2011. "Safeguarding cultural heritage: Law and policy in Fiji."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12: 329-334.
- Temño, Ignacio. 2017. "The Odyssey Case: Press, Public Opinion and Future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46 (1): 192-201.
- The Guardian. 2017. "Treasure and Intrigue: Scientists Unravel Story of 1740 Kent shipwreck."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7/aug/18/treasure-and-intrigue-scientists-unravel-story-of-1740-kent-shipwreck> (August 19, 2019).
- The United States. 2010. "Brief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micus Curiae in Partial Support of Claimant-Appellee Kingdom of Spain." <https://2009-2017.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79335.pdf> (December 08, 2020).
- Throckmorton, Peter. 1998. "The World's Worst Investment." In Lawrence Babits and Hans Tilburg, eds., *Maritime Archaeology: A Reader of Substantive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New York, NY: Springer.
- Tjoa-Bonatz, Mai. 2016. "Struggles over Historic Shipwrecks in Indonesia." In Brigitta Hauser-Schäublin and Lyndel Prott, eds., *Cultural Property and Contested Ownership: The Trafficking of Artefacts and the Quest for Restitution*, pp. 85-107.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Trails, David. 1986. "Schliemann's Mendacity: A Question of Methodology." *Anatolian Studies*, 36: 91-98.
- Veres, Zsuzanna. 2013. "The Fight Against Illicit Trafficking of Cultural Property: The 1970 UNESCO Convention and the 1995 UNIDROIT Convention." *Santa Clar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2: 91-116.
- Villanweva, Robin. 1995. "Note, Free Trade and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The Need for an Economic Incentive to Report Newly Discovered Antiquities." *George Washingt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Economics*, 29: 547-580.
- Vrdoljak, Ana. 2006. *International Law, Museums and the Return of Cultural Object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orkshire Post. 2004. "5m Plan to Bring Back Trawler." <http://www.yorkshirepost.com>.

co.uk/news/163-5m-plan-to-bring-back-trawler-1-2548238 (August 19, 2019).

Zamora, Tatiana. 2008. "The Impact of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n the Preserva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International*, 60 (4): 18-30.

Zhao, Hongye. 1992.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Historic Shipwrecks in China."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23 (4): 305-333.

決議與判決

Attorney General of New Zealand v. Ortiz, [1982] 2 W.L.R. 10 (Q. B.), [1984] 1 A.C. 1 (C.A., H.L.).

Autocephalous Greek-Orthodox Church v. Goldberg, 717 F. Supp. 1374 (S.D. Ind. 1989).

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 (Ukraine v Russian Federation) ITLOS Case No. 26; *The 'ARA Libertad' Case (Argentina v Ghana)* ITLOS Case No. 26.

Chance v. Certain Artefacts Found and Salvaged from the Nashville, 606 F Supp 801 (D Geo 1985).

Cobb Coin Co v. Unidentified, Wrecked and Abandoned Sailing Vessel, 549 F Supp 540, 561 (SD Fla 1982).

Columbus-America Discovery Group v. Atlantic Mutual Insurance Co, 974 F 2d 450, 1992 AMC 2705 (4th Cir 1992), cert. denied, 507 US 1000 (1993).

Columbus-America Discovery Group v. Atlantic Mutual Insurance Co, 203 F 3d 291, 297 (4th Cir 2000).

General Conference of UNESCO. 1999. "Report by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Promoting the Return of Cultural Property to Its Countries of Origin or Its Restitution in Case of Illicit Appropriation on Its Activities." UN Doc. 30 CIREP.

Klein v. Unidentified, Wrecked and Abandoned Sailing Vessel, 758 F 2d 1511 (11th Cir 1985).

Malaysian Historical Salvors, SDN, BHD v.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for Annulment, 16 April 2009) ICSID Case No ARB/05/10 para 4.

Odyssey Marine v. Unidentified Shipwrecked Vessel, 657 F 3d (11th Cir 2011).

RMS Titanic, Inc v. Wrecked and Abandoned Vessel, 286 F 3d 194, 197-98, 2002 AMC 1136, 1138-39 (4th Cir 2002).

RMS Titanic, Inc v. Wrecked and Abandoned Vessel, 742 F Supp 2d 784, 792 (ED Va 2010).

Treasure Salver, Inc v. Unidentified, Wrecked and Abandoned Sailing Vessel, 408 F Supp. 907 (D Fla 1976), aff'd, 569 F 2d 330 (5th Cir 1978).

UNESCO. 1996. "Report of the Meeting of Exper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UNESCO Doc. CLT-96/CONF.605/6 12 para. 48.

UNESCO. 2017.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Meeting of States Parties." UCH/17/6.MSP/INF.7REV2.